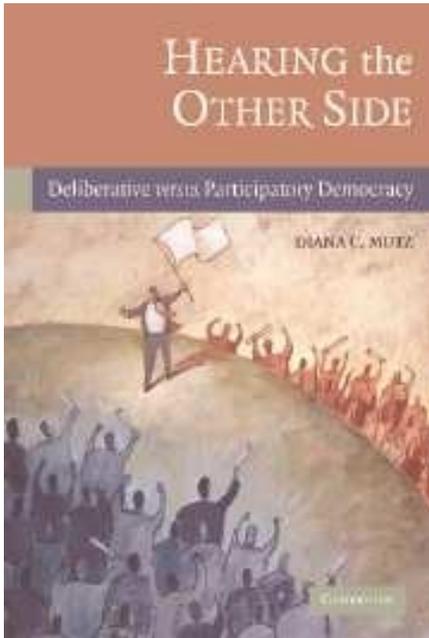


Mutz, D.C. (2006).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看似平凡的政治參與行為——選舉、投票、談論政治——潛藏著一些邏輯上的矛盾和甚至反民主的因子。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理論家相信，民主社會中大眾藉由接觸到多元的政治觀點，將會更加理性地討論政治議題。同時，透過政治的議論，大眾將會接觸到多元的政治偏好。這兩者若形成正向的循環，將可以為民衆的政治參與（投票、捐款、上街頭等）帶來動能。由於這個論述為民主社會的未來建構了美好的圖像，說服了不少學者相信審議民主可以透過公民會議的方式來落實，亦即藉由不同聲音的公民一同參與特定議題的討論，讓領導者或立法者作出更好的決策。也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政治議論的效果抱持著樂觀的看法，以為民主社會就應該刺激政治議論，使得電視廣播的 Call-in 節目和各式各樣爆料得到了理論上的正當性。

選民在街頭街尾討論政治顯示是較正式的公民會議更自然、更自發、更貼近一般選民日常生活的行為，也更接近審議民主這個概念。正當公民會議的實踐受到愈來愈多的政治學者的質疑，而另一方面從事政治傳播研究的學者正力圖發掘審議式民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落實、這樣的生活對選民在民主素質上的影響，而本書正是這些研究中最突出的作品之一。

Diana C. Mutz 是美國賓州大學政治與傳播學的 Samuel A. Stouffer 教授。這本著作是她自 2000 年以來一系列研究的綜合論述。這本書最難得之處，在於它有豐富的統計分析作為佐證，點出目前高舉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政治議論人際網絡的多元性（heterogeneity），對選民的正面及負面影響：正面的影響是接觸並認知道多元的政治觀點可以提高選民的政治容認度而負面的影響是這樣的認知降低了政治參與的意願。舉例而言，對一個生活中同時擁有支持泛藍和泛綠陣營親人或朋友的選民來說，他對於互相對立的見解會有較高的包容心，但同時他會對政治參與冷感。這本書點出了這個矛盾的現象、作出解釋，並試圖提供一些建議。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 “Hearing the Other Sid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解釋了這個研究主題的重要性，並回顧審議民主的文獻。Mutz 列舉了重要思想家對於審議（deliberation）的重要性之後，重新給予審議一詞一個操作型定義「透過談論政治使自己接觸到完全不同的政治觀點」（頁 6）。她為了避免與公民會議裡談的審議相重疊，她在本書多以「跨觀點的接觸」（cross-cutting exposure）或多元政治網絡（diverse political networks）等詞來為自己的研究設計及詮釋的範圍聚焦。Mutz 把審議民主重新對焦在政治議論，從而與倡議公民會議的論述加以區隔的原因，在於她質疑這些對小眾的案例研究或實驗有多大呈度可以上昇到理論的層次，進而解釋大眾的行為上。

文獻回顧的結果點出了學界知道但未積極處理的問題：其一、理論家對審議民主的期望尚未充分得到實證證據的支持。其二、既有的研究指出，人們在政治議論時，有「物以類聚」的

現象，即喜歡與偏好相近的人（the like-minded）交談，但還沒有人檢視這些發現與選民的民主特質的關聯。有了問題意識之後，Mutz 解釋他的觀察對象是人際網絡（social networks），而不是社會脈絡（context）。她認為即使是身處一個看似較鄉村多元的大都會中，民衆仍然可能在其個人所織起來的人際網絡中感受到親朋友好在投票意向上的同質性。因此，Mutz 主張研究政治議論的對象應該是人際網絡和它的組成，而不是受到地域限制、傳統概念下的社會脈絡（頁 10-12）。

Mutz 在本章結尾提到，當政治學者研究政治議論的諸多現象時，總是把注意力放在投票偏好上，她建議，除了投票偏好之外，選民的生活中與民主政治相關的特質，亦值得研究，因此，她選擇在接下來三章進行政治議論對選民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與政治包容度（political tolerance）影響的分析。

第二章 “Encountering Mixed Political Company: With Whom and in what Context?” 主要是交待本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初步發現。她使用三種民調資料檔作為描述統計的分析的依據，讓數據說明她所關懷的問題的特殊性。本章的中段十分精彩，讀者會看到許多想當然爾的現象在這些實證資料前幾乎站不住腳。例如，就談話的對象看，選民主要議論政治的伙伴不是理論家所期待的持相反意見者，而是最親近的家人與朋友。可是，受訪者從他們的親朋好友身上感受到的觀點異質性卻最少。接觸到不同觀點的場合主要來自同事，但受訪者多表示他們與工作伙伴在政治議論上的互動最少（頁 25-29）。就選民基本資料來看，生活中常會感受到完全對立的觀點的並不是收入高、教養好的白人，相反的，是收入與教育程度較低的「非白人（non-white）。政治知識高、對政治議題興趣濃、偏保守派、或參加的社團數多的選民，其生活中感受到的政治觀點的同質性反而比政治知識少、興趣低、自由派、及不太參加社團的人為高（頁 30-36）。你以為朋友多的選民，就比較容易接觸到多元的觀點嗎？其實未必。人際圈大的選民，他們圈內的同質性反而可能高過人際圈小的選民（頁 41-44）。

本章後半試圖為這些初步的發現提出一個解釋架構，指出這些現象的根源是政治信念（core values）的相似性。選民一開始就是依此來建構親疏遠近的人際網絡。網絡建立之後，很自然地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這些被認為是「自己人」的選民，也很自然的使圈內的同質性愈來愈高。有意思的是，這個現象雖非舉世皆然，但在美國人身上十分明顯，且與日本、香港呈現了有趣的對比（頁 46-54）。在理論層次上，Mutz 在本章批判了在人際網絡研究上的大將 Robert Huck felt 等人於 2004 年的另一本類似著作中所提出的樂觀觀點（即多元觀點並不容易消失）。Mutz 認為美國選民很有可能在現在和未來生活在觀點同質性高的環境，而非觀點多元的環境。

第三章 “Benefits of Hearing the Other Side” 談到了接觸對立的意見對民主社會總體的好處。本章繼續第一章對審議民主中的公共論壇及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的質疑，但批評歸批評，Mutz 也公平地指出，現今審議民主的研究尚未充分解答審議式民主理論中所陳述的美好境界，在現實生活中有多好或多壞的效果。本章前半為社會學與心理學的文獻整理，歸結出政治議論的一個重要好處在於增加選民對不同觀點的容忍度。這個好處的前提是，選民必須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對立的觀點。但是為什麼在同質性偏高的親朋好友之間仍然會出現不同的觀點，而這觀點又可以被容忍呢？Mutz 認為，是因為除了理性的判斷和接觸同事之外，還有情感的聯繫（affective ties）可以幫助認知到多元觀點的存在。由於情感，親朋好友的不同意見仍然可以被包容（見頁 67 的分析架構）。Mutz 在本章結尾提出了建議：若要

使美國的社會透過審議民主的方式變得更加包容，選民應該普遍結交較多的「弱連結」（weak ties），即較不那麼親密的朋友。

第四章“The Dark Side of Mixed Political Company”談的是接觸多元觀點對民主的可能傷害，即降低選民政治參與的熱情。一開始 Mutz 整理了導致政治參與熱情降低的文獻，提出「跨觀點的壓力」（cross-pressures）的概念，並導出一個待證的假設。這個概念指涉的是民衆面對不同的政治觀點及社會期待時會產生壓力，而這些壓力與何整理出自己的思緒及判斷自己是否採取行動息息相關。接觸愈多元的觀點，跨觀點的壓力就愈大，而感受到的觀點衝突程度及模糊地帶（ambivalence）也就愈大（頁 95）。

Mutz 指出，學界已經發現不少因為內在觀點衝突對選舉行為的影響（見頁 105），但她在這一章所要探究的，是當選民跨觀點的壓力（自變項）愈大時，政治參與的動能（依變項）是不是愈小。這個假設中，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她認為，社會責任感（social accountability）高的選民相信社會穩定與避免衝突是比較高的價值，因此，當他們感受到的跨觀點壓力愈大時，他們愈不願意參與政治活動。這個部分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是直接的。另一方面，跨觀點壓力對政治參與的影響又可以是間接的。由於跨觀點的壓力可能導致選民產生較高的內在衝突（intrapersonal conflict or ambivalence），這壓力便透過內在的衝突間接地降低了選民政治參與的興趣。Mutz 的資料分析結果，都支持了假設的陳述。除此之外，她進一步發現，自變項對依變項的直接影響程度，大過間接影響程度（見頁 109 至 121 的分析）。總結而言，Mutz 認為選民之所以會在愈多元的社會環境裡在政治參與上表現得愈消極，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為了避免因政治參與而犧牲了自己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

第五章“The Social Citizen”總結前三章的發現，並以這些發現來探討幾個重要的議題，例如一般人或將政黨作為分裂社會，造成民衆對政治參與失去興趣的幕後黑手，但 Mutz 認為政黨切割議題並非民衆失去參與政治興趣的主因，而是審議民主的期待之中，包含了兩個並不相容的原素——在多元觀點的社會中既要理性思辯，又要積極參與或關心政治。她認為鼓吹其一，則很可能犧牲其二。她進一步認為，現實的社會中民主社會中同質性高與異質性高的人際網絡同時並存：同質性高的人際網絡將刺激某些選民的積極參與政治議題或社會運動，這樣的社群也比較容易動員，而異質性高的人際網路將帶給另外一群選民更多思性思辯的空間。所以，如果一定要選擇，她會選擇多讓民衆感受到多元觀點，而減少刺激民衆投入政治的參與。因為鼓吹政治參與的結果，很可能是政治活動的舞台漸為同質性高的社群所佔據。尤有甚者，是這些社群中成員愈是投入，他們的視野將可能愈來愈窄、愈來愈不易改變、愈來愈不容易包容異見（見頁 127-136）。

至於如何解決這樣的矛盾？Mutz 在本章後半提出了一些建議。首先，選民必須在追求人際和諧時，學習有技巧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例如「我不同意你支持的對象，但我們將仍是好朋友。」第二、避免選擇性的收看或收聽某些政論性的節目。第三、如前所提到的，增加弱連結。即使如此，面對實證資料的證據所呈現的趨勢，她在文末不免擔心這些解決方案杯水車薪。

本書在學術上的價值，在於它以實證的發現回應理論的發展。本書雖然不是第一本探討民主社會潛藏危機的著作，但卻是第一本以議論政治這個政治行為作為關懷的焦點來探討學理與

現實差距的專書。由於實證的分析不能脫離理論，且理論應該能解釋實證研究所發掘的現象所以本書的立論架構與寫作方式，值得正在攻讀政治理論或是學習統計分析技巧的研究生參考。

Mutz 試圖拉近理論與實證的距離，但她並非做到完美無缺。Mutz 將審義民主中審議的概念重新界定及限縮，導致實證的結果及其推論不易直接回應到審議民主理論上。其次，她在社群如何影響選民，且影響了那些層面作了分析時，只舉出了政治容認度與政治參與兩個例子。這兩個實證發現雖然有力，但尚不足夠全面否證審議民主所建構的理想圖像。第三，Mutz 將「接觸多元觀點」定義為接觸到完全相對立的觀點，而認為「沒有意見」或「相似卻不相同」的意見不算是夠明顯的多元觀點，因此，她將這些受訪者資料排除在分析之外。這個做法是否妥當應該會引起爭議，而這樣的安排也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和問題的嚴重性被誇大。

儘管如此，Mutz 終究在本書明白地傳達了兩個重要訊息：未經選實證檢驗的理論可能落於過分樂觀，而過分強調政治參與而忽略讓多元觀點流動的民主可能走向極端。前者與公民會議實踐的成果報告相呼應¹，而後者則解釋了美國選民在投票偏好上日趨對立的現象。

今日台灣所面臨社會二元對立以及政治議論漫天的現象，比起美國的社會，實不遑多讓。這本著作所呈現的問題及解決方案，值得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士及有心培育具有民主胸懷的下一代的家長作為借鏡。至於台灣的民主有多大程度相應書中描述的現象、是不是民主國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則有待更多的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學者來解答。最後，本書雖是屬於學術著作，但作者以巧思與流暢的文筆，將統計研究的發現用簡易的圖表顯示，使本書十分適合大眾閱讀。本人願將此書推薦給對微觀政治現象（micro-politics）有興趣的讀者。

¹ 陳東昇，2006，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台灣民主季刊》三卷一期，頁 77-104。本處引言出自頁 101。